

# 第一编

## “五四”文学时期 (1917—1927)



# 第一章

## “五四”文学革命

“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历史条件——“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内容和意义——对封建复古主义者、封建复古派的斗争和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

### “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历史条件

中国现代文学以一九一七年的文学革命为开端。从此，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文学终于被中国现代文学所替代。“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在“五四”前几年就开始酝酿，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和阶级的根源。

“五四”文学革命，它是旧民主主义文学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但又同旧民主主义文学革命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十九世纪末叶，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为了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

机，强烈要求改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积弊。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就是这些民主变革要求的具体表现。他们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向中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思想。严复翻译的达尔文进化论（《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原富》）、穆勒的形式逻辑（《名学》）、孟德斯鸠的社会学（《法意》）等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此外，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等，评论时政，译介外国政事和著作，提倡文学改良。当时，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记》等对读者产生过巨大影响，使中国人首次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与此同时，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和“小说界革命”等，都试图在文学形式上有所改良和革新。这时出现的被称为“谴责小说”的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等，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腐败，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起过配合作用。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倡导文学革命，章太炎以及柳亚子等南社作家的作品，当时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反封建的不彻底性，这些文学改良运动都先后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它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准备。

“五四”前几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直接背景和动因。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未完成。革命成果被封建军阀篡夺了去，中国依旧未能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国内政局仍旧极为混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势力有显著增长，无产阶级也同时壮大起来。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一批接受西方新思潮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深感必须大力揭露封建思想的

罪恶，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之必要，《新青年》杂志就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一九一五年九月，综合性的文化批判刊物（新青年）（第一卷叫《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了。它的主编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陈独秀。一开始它就高擎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六点希望。这些主张虽还不够明确和鲜明，但实际上包含了“民主”与“科学”两方面的要求。

（新青年）在“五四”文化革命和新文学运动中立下了伟大的功劳。随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这场启蒙运动发展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可以说新政治、新经济促使了文学革命的产生。同时，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又与中国的近代文学和外国的进步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它是“五四”以前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发展。中国近代进步文学孕育了“五四”文学革命。我们从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上，从文学的体裁和表现方法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渊源关系。而外国进步文学特别是欧洲的近代进步文学，也同样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

##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内容和意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指出，“五四”以前，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在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五四”前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他进一步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早倡导文学革命的是胡适和陈独秀。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阐述了文学改良必须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这“八事”触及旧文学的弊害，特别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取代言言文，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后来被人称为“八不主义”。尽管他主要是从文字和表现形式改良着眼的，但他毕竟是发难者，有其突出的历史功绩，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的评价。

同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明确提出“三大主义”的主张，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号召“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不顾迂儒之毁誉”，

既反对“萎琐陈腐”的封建思想内容，也反对“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的形式。他把矛头直指封建文学，要比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坚决得多，激进得多，其重点是思想内容方面的改革，狠狠地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封建文学，扩大了文学领域内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影响。

一年后，胡适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中心意思还是提倡白话文。当时，为了反对文言文的弊病，提倡白话文是有重要意义的。

胡适、陈独秀的主张，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钱玄同斥责旧文学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说明白话文势必取代文言文。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议。

稍后提倡新文学的是鲁迅和李大钊。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三》中精辟地指出：“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指出：“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

为了要扩大新文学阵营的影响和给封建复古派一次沉重的打击，新青年编辑还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发表了“双簧信”，即编辑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了旧文学阵营反对新文学和白话文的种种观点，给《新青年》写信，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大放厥词。然后由另一位编辑刘半农以记者的身份，同时发表《复王敬轩书》，痛快淋漓地逐点批驳。这合伙炮制的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双簧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由于这些先行者们的积极倡导，一场文学内容的大变革、文学语言的大解放的文学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转变到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翌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歌颂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热潮中，《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办成了“马克思研究”专号，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随着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相继翻译出版，一九二〇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涌现了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一九一八年间，《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编辑部扩大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胡适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这就形成了以《新青年》为核心，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团结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争。

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充分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就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文。从此，它发表了不少白话新诗和白话小说，有力地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展。

与此同时，新文学阵营还积极开展如何建设新文学的讨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鼓吹“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他反对“非人的文学”，其实质就是提倡人道主义文学。在另一篇《平民的文学》中，他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这个口号。这些主张无疑在当时起过积极作用。

一九一九年一月，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是对《新青年》杂志提倡以反对封建的旧道德、旧文学和文言文，倡导反帝反封建的新道德、新文学和白话文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口号的概括和初步总结。他更加鲜明地提出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

口号，表达了“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决心。

从此，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与此同时，更多地宣扬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如《每周评论》、《新潮》、《湘江评论》、《觉悟》、《少年中国》、《星期日》、《新生活》、《曙光》等相继创刊，有力地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向前发展。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大大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使这场文学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其本身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揭开了我国文学史崭新的一页。首先，它以前所未有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从理论到创作，从内容到形式，对旧文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次，新文学以它新的题材、新的主题和新的语言形式所取得的文学创作实绩，替代了腐朽的、僵化的封建旧文学的统治地位，显露了它蓬勃发展的生机。毛泽东深刻地提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诚然，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还是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反对党八股》），应该说这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最中肯的批评。

“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它带来的是文学观念、内容、形式等全方位的大革新和大解放。

“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许多与旧文学迥然相异的大量崭新的文学作品，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展。继《狂人日记》之后 鲁迅的《孔乙己》、《药》 冰心的《斯人独憔悴》 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等小说，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等的诗歌，胡适的《终身大事》，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等戏剧，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以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出现在文坛上。这些作品，体现着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充满着时代精神，表达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它们摒弃了文言文而用白话写作，努力表现现实生活，既与传统的民族文学有着血肉相联的渊源关系，又广泛吸收了外国进步文学表现手法的长处，从而把中国的现代文学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其次是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大量涌现。

据茅盾不完全的资料统计，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全国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有一百多个，纯文学刊物有三百多种。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成绩最突出一个文学社团。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于北京，是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组成的。其机关刊物为《小说月报》 随后还编辑了《文学旬刊》、《诗》、《文学周报》、《我们》等刊物，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一百余种。它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成立了分会，会员逐渐增多，有朱自清、谢冰心、俞平伯、陈毅、黄庐隐、王鲁彦等百余人。瞿秋白、张闻天、冯雪峰等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正式成员。他们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其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艺术”。文研会的三项宗旨是：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他们在反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建设白话文，普遍关注社会人生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在反对以文学为游戏和沉湎于情爱的鸳鸯蝴蝶派，对颓废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观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方面也采取基本一致的态度。

到了大革命时期，文研会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的人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去，更多的人仍循着“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主张继续从事创作，还有的人低吟着人生的哀歌，唱着灰色消沉的调子，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一九三二年一月，《小说月报》毁于“一二八”炮火，文研会无形中解散。

被称为“异军突起”狂飙猛进的创造社，是“五四”时期另一个成立较早、影响最大、成绩最突出的文学社团。一九二一年六月成立于日本东京，发起人和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从一九二二年五月开始，先后创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多种刊物。“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学活动”是他们的文学主张，他们倾向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以一九二五年左右为界，创造社的活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创造社前期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主张，给人一种矛盾和含混的感觉。一方面他们强调“内心的要求”和“尊重自我”，追求艺术的“全”与“美”，尊重天才，受到了艺术至上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主张文学要“表现时代的使命”，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打破毒龙的宫殿”，“反对一切既成的道德”，要“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一九二五年以后创造社的一些主要成员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在革命形势的推动和影响下，创造社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口号，标志着创造社的转变。大革命时期一部分成员分化出去，同时又增加了一批生力军——彭康、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阳翰笙等刚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更促使了它向左转化。一九二八年，经过整顿了的创造社和另一个革命文学社团太阳社共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摧残。一九二九年二月，创造社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

除文研会和创造社外，还有一批比较活跃的文学社团也为新文学的发展各自做出了贡献。语丝社为鲁迅所支持，办有（语丝）周刊，

主要成员还有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孙伏园等。与语丝社同时活动的有未名社、莽原社，办有《未名》、《莽原》等刊物。在鲁迅的培养帮助下出现过一些作家，如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高长虹、向培良等。浅草社办有《浅草》，其骨干成员后又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等，主要成员是陈炜谟、陈翔鹤、林如稷、冯至、杨晦等。鲁迅夸奖过“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湖畔诗社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是一个专以写作爱情诗闻名的文学社团。此外，还有新月社、南国社、弥洒社、狂飙社、民众戏剧社等，就不一一介绍了。

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的大量涌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文学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是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外国文学理论及创作的翻译和介绍，这是文学革命为适应社会变革的产物和必然结果。

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以开放的态度通过翻译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介绍外国文艺思潮，使闭塞的中国文坛引进了新鲜的现代气息。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郭沫若、沈雁冰、胡适、刘半农、郑振铎、周作人、耿济之、瞿秋白、田汉等人，都积极地从事外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体现了革命文学的实绩。《新青年》最先把欧洲等国的优秀作品译介出来，出版过“易卜生专号”，发表的《娜拉》、《国民公敌》等剧作影响甚广。俄国的现实主义，欧美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派文艺思潮以及积极浪漫主义都对中国的许多现代作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期间，那么多的西方文学思潮涌入中国，是文学史上的罕见现象。这一中西文化的大撞击和融合，对中国的文学界、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文化思想的大束缚，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当然，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外国文艺思潮，任何一个民族都有

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但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和现代作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并逐渐成为主导地位的潮流，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则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潮。特别是早期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等人，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与中国文艺运动实际相结合的尝试，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要求作家接近工农大众，并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等，对新文学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预示着新文学发展新趋向。

在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不可逆转的形势下，一九二〇年，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承认白话为“国语”，被迫宣布用白话取代已经僵化了的文言文，并通令全国国民学校采用。

总之，“五四”文学革命正是以它从理论主张到文学创作，从作品内容到语言形式大革新、大解放，揭开了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光辉的一页。正是这场革命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础，展示出中国现代文学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对封建复古主义者、封建复古派的斗争和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

文学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必然引起封建复古主义势力的惊慌失措和强烈反抗，他们必然会跳出来，攻击新文化运动，竭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文化，在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面前进行垂死的挣扎。

首先，新文学阵营和封建复古主义者、称之为“桐城谬种”的林纾与“选学妖孽”的刘师培之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三月，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国故》月刊，以所谓“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不久，曾为翻译

小说作过贡献的七十老翁林纾（琴南），自称“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写了《论古文之不当废》、《致蔡鹤卿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等文，大肆叫嚷“孔孟不可覆，伦常不可铲”，竭力维护旧礼教，维护文言文，对白话文大加嘲讽。他还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两篇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攻击诋毁新文学倡导者，企盼和暗示有一个“伟丈夫”出来镇压新文化运动。

针对封建复古主义者的疯狂反扑，新文化阵营予以坚决的反击。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严正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李大钊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中，揭露了林纾之流妄图借军阀势力，对新派人物实行武装镇压的阴谋，断然表示“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给林纾之流当头一棒。

蔡元培在《答林君琴南函》中，驳斥了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指责，阐述他的一贯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显然有利于新思潮的传播和发展。

鲁迅对复古派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批判和揭露。他在一九一八年七月给钱玄同的信中，指出那些保存“国粹”的“大小昏虫”，乃是“等于放屁”的“一群坏种”；指出“文选派”的刘师培则是辛亥革命的叛徒，是“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复古主义者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嘴脸。

鲁迅还在《热风》的一系列杂文中，尖锐地指出“国粹”的“粹”，其实就是“瘤”，就是“疮”，与其保存国粹，还不如割掉的好。他嘲讽林纾的行径是“现在的屠杀者”。

反对林纾、刘师培之流复古主义者的斗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斗争中第一次重大的战役。这些保存国粹的封建遗老们不堪一击，被批驳得体无

完肤。它扫除了新文学运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壮大了革命文学阵营的声威。

其次，是对“学衡派”的斗争。

以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一九二二年一月在他们创办的《学衡》杂志上，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竭力攻击新文化运动。他们自命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其实是穿着西装的封建遗老遗少。在他们的文章中，诬蔑马克思主义为“一家之邪说”，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们攻击新文化运动，诬蔑文学革命“过于偏激”，主张文化改良和模仿佛古人；他们反对以白话替代文言，鼓吹文言优于白话，主张语言与文字不能合一，极力为文言文辩护。

“学衡派”的反动观点一出笼，便立即受到邓中夏、沈雁冰、沈泽民、郑振铎等人的迎头痛击。批判“学衡派”最有力量的是鲁迅。他在《估学衡》中，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戳穿了这次“假古董”的把戏，“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学衡派“文且未亨，理将安托”，实在没有与他们作理论争辩的必要，只要大概估一估就可以了。最后，鲁迅嘲讽他们道：“总之诸公诋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作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鲁迅深刻的揭露使“学衡派”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尽管《学衡》杂志还断断续续存在一段时间，但它早已声名狼藉、名存实亡了。

第三，是对“甲寅派”的斗争。

继“学衡派”之后，向新文学革命运动发起进攻的是“甲寅派”。

一九二五年七月，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以周刊的形式在北京复刊。他大肆宣扬尊孔读经，主张读经救国，竭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甚至主张恢复封建科举制。他连续发表《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章，反对白话文，攻击新文化运动。他凭借军阀政府的反动势力，发布“整顿学风令”，禁止学生用白话文作文，其气焰十分嚣张，成为新文化运动前进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甲寅派”在理论上不值一驳，但由于它权势大，必须加以狠狠地打击。当时新文化阵营对“甲寅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仿吾、郁达夫、沈雁冰、魏建功、唐钺等纷纷发表文章，批判了“甲寅派”的谬论。鲁迅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许多杂文，对“甲寅派”的批驳最有力量。围绕着“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鲁迅写了许多犀利的杂文，向章士钊发动猛攻。《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评心雕龙》、《古书与白话》、《再来一次》等，深刻地揭露了“甲寅派”提倡“尊孔读经”、“读经救国”的虚伪和欺骗性，提出他们的文章不通，文字庞杂，连成语典故也用不清楚，甚至弄错，岂不可笑。在《答KS君》中讽刺章士钊道：“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讪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章士钊向新文学运动的反扑是不得人心的，就连早已向封建势力妥协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胡适，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也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嘲笑章士钊。

新文化阵营对封建复古派的斗争，前后持续了四五年之久，充分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威势。“学衡派”和“甲寅派”的垂死挣扎，是封建复古主义者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从此以后，复古的声浪日趋低落，布不成阵了。

封建复古派接二连三地向文学革命阵营进行反扑，这种现象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它说明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必然会引起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的极端恐惧和强烈抵抗。这说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相当复杂和激烈的。文学革命阵营与封建复古派、保守派的斗争，不单纯是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斗争，其实质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革命文学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文学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文学战线上的反映。

第四，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

新文学运动与封建复古派作斗争的同时，“鸳鸯蝴蝶派”也重整旗鼓与新文学运动对抗。

“鸳鸯蝴蝶派”又称“礼拜六派”，是一个带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学派别，曾风行于辛亥革命前后，其大本营在上海。这个文学派别的形成，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曾有详尽的描述。它渊源于晚清专写才子佳人的哀情、狎邪小说，描写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一九一四年《礼拜六》周刊和《眉语》月刊相继出版时，这个派别可谓极盛一时。后来《眉语》遭禁，《礼拜六》停刊，但其势力并未消退，直到《新青年》盛行起来才受到了打击。“五四”运动高潮过后，他们趁封建复古派向新文学运动反攻倒算之机，东山再起，在上海复刊《礼拜六》，改用白话文，并发行多种书刊，与新文学阵营争夺地盘。

“鸳鸯蝴蝶派”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势力在文学上的要求。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复古主义文学的一个变种，他们无所谓理论，只是在作品里渲染红男绿女的爱情生活，满纸的风花雪月、哥哥妹妹、卿卿我我，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颓废情调和没落的封建阶级的苦闷哀鸣，起到了麻痹人们斗志，腐蚀人们灵魂的恶劣作用。其代表人物是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等人。他们先后出版了包括《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在内的上百种